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历程与重大意义研究综述

聂文婷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 102488)

摘要:1964 年 10 月 16 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试爆成功促使中国国防现代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同时也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的大国地位。近些年,随着相关文献、著作和论文的陆续问世,学术界也展开了对原子弹研制历程以及其重大意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的决策、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进程中重要历史事件、中国原子弹研制与中国国家安全、中国原子弹研制的重大意义等四个方面。本文将对以上研究成果作一综述。

关键词:中国第一颗原子弹 核决策 国家安全 国防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K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447(2012)01-0038-07

1955 年 1 月,中国共产党作出发展原子能事业的重大战略决策。1964 年 10 月 16 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试爆成功。从此,中国国防现代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的大国地位得以极大的提升。

原子弹的研制对国家发展战略来说意义重大,因此,学界关于中国原子弹研制历程与重大意义的研究也因大量档案尚未解密而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值得欣慰的是,自上世纪 80 年代初以来,随着《聂荣臻回忆录》^[1]、《秘密历程——记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诞生》^[2]、《当代中国的核工业》^[3]的出版,相关文献、著作和论文陆续问世。大致可以划分为四类。一类是相关历史文献,有《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周恩来军事文选》、《聂荣臻军事文选》、《聂荣臻科技文选》、《张爱萍军事文选》、《罗瑞卿军事文选》、《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叁、柒)^[4]。第二类是当事人的传记、年谱、回忆录和纪念性文章。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周恩来传》、《周恩来年谱》、《朱德军事活动纪事》、《聂荣臻传》、《聂荣臻年谱》、《上将张爱萍》、《从战争中来》^[5];曾领导原子弹研制工作的宋任穷、刘杰、袁成隆、李觉^[6]等人的回忆录和纪念性文章;钱三强、郭永怀、王淦昌、朱光亚、程开甲^[7]等从事核研究的科学家,或本人,或由他人撰写的回忆性文章。第三类是相关史料的梳理与汇编,主要有《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简史(1950-1985)》、《当代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8]。第四类是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相关的专

题性研究。依据研究视角并结合原子弹研制历程,具体主要集中于对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的决策、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进程中重要历史事件、中国原子弹研制与中国国家安全、中国原子弹研制的重大意义等四个方面的研究。此外,还有一些纪实性著作、文章以及电视纪录片,如《天地颂》、《未被揭开的谜底》、《东方巨响——中国核武器试验纪实》、《596 秘史》、《原子弹调查》、《倚天——共和国导弹核武器发展纪实》、《中国历史上一次惊心动魄的创举——我国携带核弹头的导弹在本土上空飞行爆炸试验》、《驯核记》、《国之利器——当代中国两弹一星事业》^[9]等。这类纪实性的成果多来源于作者对当事人的采访,再加之多偏文学性描述,甚至或多或少带有些许传奇色彩,其内容缺乏完全的权威性与可信度,但其所提供的诸多历史细节信息,为我们全面了解这段历史带来了诸多裨益。

笔者认为,从总体上看,前三类成果大都偏重于对史料的梳理和考订,对历史研究而言,具有提供信息和初步导向的功能。相比之下,第四类研究成果除比较偏重学理层面外,视角也比较新颖,有一定的理论升华,能够在深入挖掘史料的基础上阐明学者对相关问题独到的见解。因此,在下文中,笔者将对第四类研究成果作一综述。

一、关于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的决策

1955 年 1 月 15 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

收稿日期 2012-01-02

作者简介:聂文婷(1985-),女,内蒙古阿拉善盟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当代史专业博士研究生。

记处扩大会议。这次会议作出了要发展原子能事业的重大战略决策,是我国原子能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会议。从此,中国进入了“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10]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高瞻远瞩,适时作出这一决策意义重大。因此,有关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决策的研究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之一。

国外学者对于中国发展原子能决策原因的研究抱有特别的兴趣:一个经济、技术基础十分薄弱的国家为什么要掌握原子能这项高技术?对这一问题的考察可以追溯到上世纪 60 年代初。1962 年,爱丽丝·兰格里·谢出版了《中共在核时代的战略》^[11]一书。这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一本研究中国核战略的专著。谢认为,自 1945 年美国核试验成功并在日本投爆原子弹以来,中国领导人关于核武器的理念和实践经历了一个最初只在偶然场合提及核武器,到 1954 年开始出现“好战倾向”并最终决定依靠苏联力量发展核武器的变化过程,而导致这一变化过程形成的主要原因是核时代中国所面临的安全态势。因此,从国家安全角度出发,中国作出了发展原子能的决策。1964 年,谢在其另外一篇关于中国军事战略的文章^[12]中再次提及中国作出核决策的原因,指出中国的军事战略是受实用主义支配的,中国关于核战略的态度完全是防御性的。根据唯物辩证法关于事物发展原因和动力来源的范畴,约翰·W·刘易斯和薛理泰^[13]把中国核决策的动因归为两类。一方面,中国领导人对原子弹的认识以及一支为原子能事业积极献身的研究队伍的组建是中国作出核决策的内部因素,具体表现为毛泽东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以及科技人员对核科学研究极大的兴趣和无私的奉献精神。不过,作者的这一观点是建立在怀疑毛泽东人民战争理论的基础上的。作者认为,中国人在战争实践中逐渐体会到毛泽东的人民战争理论对于现代战争而言不相干且不实用,所以才对军事高技术 and 军队现代化产生了兴趣。另一方面,朝鲜战争、日内瓦会议和台湾海峡事件是促使中国决心建立核战略力量的外部因素。战争把中国引向了先进的武器和技术时代,包括核威胁时代。为了在这个现代的世界里生存下来,中国应该拥有也必须拥有现代化的武器。正如英国学者 L·巴达希和 M·亚历山大^[14]所言,约翰·W·刘易斯和薛理泰所能利用资料的准确性和全面性是成问题的。因此,由于一手资料掌握有限和对中国战略文化缺乏深层次的了解,上述研究难免多有偏颇之处。

相比之下,国内对此问题的研究虽较晚一些但却更为客观。作为中国核武器研制的亲历者,陈能宽^[15]认为,中国之所以下决心搞原子弹,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国家利益,特别是国家安全利益的需要。虽然新中国政治上站起来了,但军事上还受人欺负,经济上被人封锁,外交上不被某些大国承认,甚至有人以核讹诈威胁中国,形势是异常严峻的。为了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被迫下决心解决原子弹的有无问题。姚有志、孙党恩^[16]与陈能宽的观点一致,他们认为中国走上核武器发展之路,一开始就是在国家安全面临巨大压力的背景下不得已而采取的战略选择。李俊亭称中国的核决策为《使中国挺直腰板的战略性抉择》^[17]。在他看来,美国在朝鲜战争、台湾海峡危机中对中国的核威胁、核讹诈以及国外友好人士的建议和帮助共同促使毛泽东抓住时机适时作出核战略决策。徐焰^[18]则从中国发展核武器的最终目标出发,分析指出在外国的核威胁下,为禁止乃至销毁核武器中国作出了发展核武器的决策。张静在《核武器与新中国 60 年发展历程》^[19]一文中,阐释了中国发展核武器的政治意义,由此反推出中国之所以发展核武器是战略上的积极防御以及在国家安全诉求之外对民族复兴、外交独立、国际认可和尊重、追赶先进、实现现代化等多方面诉求的结果。此外,近几年,国内出现的一批对美国核威慑以及苏联核援助进行细致研究的成果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的核决策也有很大的帮助。这类文章不是直接将美国的核威慑或苏联的核援助与中国的核决策进行关联,而是通过深入挖掘史料和档案来映射其间的关系。在这方面,资料掌握相对较为充分且论证有理有力的是赵学功^[20]和沈志华^[21]。依据美国新近解密的档案文献和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赵学功对朝鲜战争和第一次台海危机中美国所实施的核威慑以及战术核部署进行了详细的阐述,揭示了美国核威慑战略的本质,指出“对中国来说,这次危机最大的影响在于,它促使中国领导人决心发展自己的核武器”。沈志华认为“赫鲁晓夫开启了中国原子能和平利用之窗”,答应在原子能的和平利用方面帮助中国,为中国核武器的研制奠定了技术基础,帮助中国迈开了核武器研制的第一步。

关于这一问题,笔者以为,中国在 1955 年初开始发展原子能事业是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既是中国自主决策的结果,也离不开外部因素的推动作用,既是一项紧迫的现实任务,也是中国国家建设与发展长远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究其原因,主要

有以下四点。第一,1945年美国在日本投爆原子弹事件后,中国共产党和广大民众对核武器有了初步的认识,这为中国共产党作出核决策奠定了思想和舆论基础。第二,核科学研究人才的延揽、相关研究机构的组建以及铀资源的初探是中国共产党核决策的前期准备。第三,朝鲜战争和第一次台海危机期间,美国的核威慑坚定了我国发展核武器的决心。第四,1954年美苏在国际社会展开的关于原子能和平利用的博弈使我国争取到了苏联的核援助,从而找到了发展原子能的突破口。总之,关于我国的核决策还有很多值得我们研究的地方。除厘清这段历史外,还要深挖相关史料,对我国核决策的背景、前期准备以及中国共产党如何抓住时机适时作出核决策等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

二、关于第一颗原子弹研制过程中重要历史事件

原子弹的研制是一项复杂且宏大的系统工程,涉及政治、经济、外交、科学技术等各个领域。近年来,随着大量档案资料的解密和中国相关史料类著述的不断发表,学界对我国原子弹研制历程的研究逐渐突破史料梳理的囿苑,转向对其中重要历史关节节点的细致考察。

1. 从发展原子能事业到研制原子弹

上文提到,我国核武器研制以我国作出发展原子能事业决策为起点。关于这一点,长久以来学术界多有认识误区:我国从作出发展原子能事业决策伊始就开始了原子弹的研制工作。而事实上,尽管我国对研制原子弹早有打算,但最初的核决策是以原子能的和平利用为突破口的。原子能和平利用的技术要想跨越成为研制原子弹的基础,不仅需要特殊的设施、设备和仪器,更需要掌握从铀分离、提纯到核爆炸的一系列专门的技术和工艺。因此,以我国当时的工业基础和工艺技术水平,以及西方进行经济技术封锁的冷战环境,要想尽快试制出原子武器,必须依靠苏联的帮助。以苏联对我国核援助的范围的变化为视角,通过对中苏《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我国建立综合性原子能工业的协定》(简称《国防新技术协定》)和《关于苏联为我国原子能工业方面提供技术援助的补充协定》(简称《补充协定》)从酝酿到谈判,到最终签署这一过程的考察,沈志华^[22]指出我国实质意义上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开始于苏联在1957年下半年决定向中国提供原子弹和导弹研制方面的尖端技术和装备之时。《国防

新技术协定》和《补充协定》的签订在我国原子弹研制的过程中具有标志性意义。从此,我国的原子能工业“进入了核工业建设和研制核武器的新阶段。”^[23]

以上论述给予我们以启示。首先,如果说我国发展原子能事业第一个突破口是在原子能的和平利用方面争取到了苏联的援助的话,那么《国防新技术协定》和《补充协定》的签订就是我国发展原子能事业的第二个突破口。但目前为止学术界并没有给予《国防新技术协定》和《补充协定》很多的关注,多数只是简单提及协定的签订,对其签订过程及意义的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展开。其次,《国防新技术协定》和《补充协定》签订之后,1958年8月,二机部党组在呈送中共中央的《关于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方针和规划的意见》中明确提出了“军事利用为主,和平利用为辅”的方针。从此,我国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战略方向发生了重大变化。但目前学界还未给予这一战略转变以高度的关注,缺乏相应的研究成果,这与这一战略转变的重大意义是不相符合的。因此,关于我国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战略方向是如何从原子能的和平利用转变为军事利用为主的研究同样值得我们进行全面深入的探析。

2. “596”工程的背后

就在我国原子弹研制工作开始全面发展之时,苏联决定停止对我国原子弹研制工作进行援助。由于苏联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的信函是在1959年6月发给中共中央的,所以我国首枚原子弹研制工程被定名为“596”工程。导致苏联停止对我国核援助的原因并不是单一的,但学者们在探讨这一问题时侧重点各有不同。亚利桑那大学政治学教授艾伦·S·惠廷^[24]认为,1958年我国军队炮击金门的主要后果之一,就是促使苏联领导人决定停止向中国进一步提供有关核武器的技术和设备,特别是原子弹的样品。戴超武^[25]除认可艾伦·S·惠廷的上述观点外,还指出在这一时期发生的“联合舰队问题”、“导弹风波”是进一步促使苏联决定停止向中国提供核技术的重要诱因。值得一提的是,戴超武认为,苏联的外交政策是同苏联对核武器作用的认识以及苏联军事战略的调整相一致的。从这一点出发,中苏两国对核武器及核战争态度的分歧是导致苏联撤援的又一原因。沈志华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是,上世纪50年代中期赫鲁晓夫已然意识到了我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重要地位及在国际共运中的领导作用,他必然会尽可能满足我国的要求,为我国提供核援助。但这也为此后苏联撤援埋下了伏笔,一旦苏联

领导人察觉到中苏关系出现一点令人不安的迹象。莫斯科首先关闭的就是核援助的大门。因此,在沈志华看来,赫鲁晓夫的个人因素与苏联停止对华核援助有很大的关系。还有学者^[26]认为苏联对华停止核援助的原因主要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如领导人个人层面冲突、发展道路上的认识差异、对重大战略的不同考虑以及中共强民族主义的处理国家关系方式。

3. 自力更生 独立自主地研制中国的原子弹

1960年8月,苏联完全停止了对中国原子弹研制工作的援助。中国原子弹研制工作进入了完全自力更生的阶段。尽管困难重重,但中国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在全国各部门、各地方以及人民解放军的大力协作和积极支援下,在广大科技人员、干部、工人艰苦努力下,大跨步地向前发展。李继耐^[27]指出,大力协同是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科学技术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是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突出体现,也是“两弹一星”取得成功的宝贵经验。作为中国核试验的亲历者,朱光亚^[28]的切身体会是:核武器试验是一项规模大、技术复杂、综合性强的核科学试验,联系着研究、生产、使用各个部门。在核武器试验中加强各单位之间的谅解、支持和团结,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大协作的优势,是我们顺利完成攻关任务的重要保证。张静^[29]认为,在60年代初期国家建设遭遇极端困难之时,面对关于国防尖端项目究竟是“上马”还是“下马”的争论,中国共产党从长计议,既考虑到国家安全的需要,又着眼于我国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坚定了继续发展以原子弹、导弹为标志的尖端武器的决心,给予了原子弹一线的领导者和科研人员以极大的鼓舞。韩文琦和张广宇^[30]在总结新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经验时指出,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上世纪50、60年代中国国防尖端武器现代化建设才得以实现突破性的发展。孙贤金^[31]则以核武器试验中的政治工作为视角,通过回顾“两弹一星”事业的发展历程,总结指出在当时国家经济技术十分薄弱的情况下,成就国防尖端技术辉煌的业绩,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充分发挥了政治工作的服务保障作用。陈士光^[32]认为,周恩来在原子弹研制攻关阶段中运用了大兵团协同作战的指挥原则,胜利实现了“两弹”成功上天的夙愿。具体包括成立中央专门委员会并身体力行从事领导工作、提出并践行“严肃认真、细致周到、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工作方针、创造性地使用系统工程领导技术、重视人才的培养等。

不难看出,有关这一时期的研究多集中于中国

原子弹研制攻关经验的论述方面,对于攻关会战的具体细节却关注不够。这段历史是中国核武器研制过程中最为艰难但同时也是取得进展最为巨大的阶段,其中中央专委工作经验的总结、社会主义大协作的发挥、后勤保障工作以及基地建设工作等方面都值得 we 进行深入的挖掘和详细的考订。

三、关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与中国国家安全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的确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巨大关注。其中尤以美国和苏联为甚。60年代美国和苏联对中国核武器研制的态度与策略选择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同时也是影响中国国家安全的的主要因素,长久以来引起学者的持久探讨。

随着大量美国安全档案的解密,学术界以美国对中国原子弹研制态度与策略选择为题的研究不断深入。多数国外学者认为,影响60年代中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因素有两个:一是美国政府准备对中国核设施进行防御性军事打击;二是美国发起禁止核试验条约以遏制中国正在进行的原子弹研制工作。张少书的《肯尼迪与中国核武器》^[33]一文首次使用了官方档案对美国企图借助军事手段打击中国核设施进行了论证。从美、苏、中错综复杂的战略关系入手,围绕中国发展核武器问题,张少书重点考察了肯尼迪政府如何评估中国核武器的影响力、美国如何利用中苏分歧以鼓动苏联共同遏制中国核研究等行动,指出肯尼迪政府早期的打算是希望能够联合苏联对中国核基地实施军事打击。为此,美国作了至少一年半的努力,未见成效后才将注意力转向了禁止核试验条约。1997年,华盛顿大学国家安全档案高级分析员威廉·伯尔、杰弗里·理查逊发表了题为《是否“杀死摇篮里的婴儿”——美国与中国核计划(1960—1964)》^[34]的论文。作者对肯尼迪和约翰逊两届政府就中国核研究展开的政策讨论和对策选择,尤其是对中国核设施实行军事打击从酝酿实施到被否决的过程,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和分析,进一步论证了美国遏制中国核计划的事实。值得一提的是,这篇论文披露了大量有价值的史实,如肯尼迪政府时期美国军备控制与裁军署主席威廉姆·福斯特曾与一位历史学家在谈话中透露,肯尼迪的确考虑过挑战政治性危险,甚至不惜牺牲美欧多边核力量提议^[35]以获得苏联的支持,共同胁迫中国签订1963年的禁止核试验条约^[36];自上世纪50年代中期起美国就使用U-2高空侦察机和间谍卫星对中国的核实验进行严密的监控和跟

踪研判;美国政府高层关于中国核试验讨论的细节等。

国内关于美国对中国原子弹研制态度和对策选择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如詹欣的《试论美国对中国核武器研制的评估与对策(1961-1964)》(《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3期)、刘洪丰的《20世纪60、70年代美国对中国核武器研制对策调整》(《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3月)、张扬的《中国和战略武器的发展与美国早期ABM部署计划》(《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1期)等,都是利用相关档案来梳理不同时期美国对中国研制核武器的认识与对策以反映美国对60年代中国国家安全所造成的影响。这其中在资料运用和史料分析上比较典型的是刘子奎和王作成^[37]2007年发表的《美国政府对发展核武器的反应与对策(1961-1964)》。通过对美国解密档案的深入解读与探究,作者对美国政府对发展核武器的各种对策选择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考察。他们指出,这一时期,美国对华的核策略除国外学者普遍关注的对中国核设施进行预防性军事打击外,还包括支持或鼓励印度和日本发展核武器以及在不放弃对中国核设施进行防御性军事打击的情况下,主要通过各种外交和宣传手段,树立美国的强大形象,贬低中国核试验的意义。基于对美国对华核对策的全面梳理,作者得出相对比较客观也比较全面的结论:20世纪60年代美国对中国的核对策基本经历了从肯尼迪时期的狂热到约翰逊时期的理性回归这样一个过程。但即使美国最后没有采取防御性军事打击,在中国发展核武器的整个过程中,军事打击一直是美国政府优先考虑的应对措施。

相比之下,以苏联对中国原子弹研制态度与策略选择为题的研究却比较薄弱。就目前搜集到的资料来看,学界缺乏对苏联向中国施加核压力具体细节的考察。当然,也有对此问题进行简单论述的。阎佼丽的《我国五十至七十年代核战略的美苏因素及现实思考》^[38]一文,就对中国第一次核武器试爆成功后苏联对中国的国家安全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定性的分析。她认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后,美国政府积极支持越南,导致越战升级,希望以此减少核爆炸后中国在亚洲的政治影响。此时,苏联取代美国成为对中国最大和最直接的威胁。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借助其在外交和军事方面的成就对中国施加压力。先是在远东部署了装有核弹头的地对地导弹,然后一支相当规模的应急部队进驻蒙古。1969年3月,中苏两国军队在珍宝岛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中国

国家安全再一次面临威胁。张少书在其《敌乎?友乎?——美国分化中苏联盟内幕》^[39]一书中也提及了这段历史,指出在当时中苏关系异常紧张的情况下,苏联国内有人甚至扬言要对中国实施大规模核打击,“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还有人主张采取有限的作战行动,以摧毁北京的核设施。

国家安全形势是军事战略需求的指向标,而军事战略需求又是武器装备发展的重要动力。从这一意义上讲,中国发展核武器是中国领导人对当时国家安全形势正确审视的必然结果。从表面上看,虽然中国原子弹的研制给中国国家安全带来了诸多不稳定因素,但这些不稳定因素的伴生却坚定了中国研制核武器的决心,中国必须尽快研制出自己的核武器才能从根本上实现国家安全目标。就当前学术界对中国原子弹研制与中国国家安全关系的研究情况来看,相关论述多以国际政治为研究视角,研究对象多为由中国原子弹研制所引发的不安全因素,对中国原子弹研制与中国国家安全关系缺乏系统的论证。因此,从国家安全角度出发对中国研制原子弹的相关问题进行深入探究并厘清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十分有必要的。

四、关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成功的重要意义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试爆成功。这一巨响打破了帝国主义的核垄断,维护了国家安全,保卫了世界和平,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正如中国邓小平所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40]。

1.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成功试爆与中国大国地位的巩固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后,国际社会要求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呼声越来越高。1971年10月25日,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随后中美、中日建交。1991年春,美国国务卿贝克访问中国,行前他向记者表示,他访问中国的原因,一是中国是一个11亿人口的大国,二是中国拥有导弹核武器。^[41]以上历史事件充分证明了中国原子弹的成功研制确实使得中国大国地位得以坚实地巩固。1999年9月25日,《中国新闻周刊》发表了题为《原子弹确立大国威信》一文,指出中国如果不解决原子弹问题,中华

民族就很难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核武器的成功研制,为中国争取到了一个国际对话的独立地位。李峻^[42]认为,中国在内穷外困的基础上迅速研制出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尖端武器,大大加强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军事实力和国际地位,对当时可能一触即发的世界局势起到了重要的稳定作用。依据外交部的相关档案,张静^[43]指出,中国核试验成功后,亚非国家和英、法的舆论都普遍认为,中国已经成为亚洲的原子大国,不能再被忽视,联合国没有中国参加、禁止核武器的努力没有中国的合作不可能起作用。联合国再不接纳中国是没有道理的。中国核试验的成功与常规军事力量的壮大不仅增强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坚持自己原则和意见的实力,而且也使得美苏等国再也不能无视中国的存在。可以看出,以上研究还停留在表层阶段,有关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成功试爆与中国大国地位的巩固关系还有待于我们进行系统的论证。

2. 中国原子弹的研制与中国国防现代化进程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试爆成功,标志着中国国防科技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人民解放军有了核反击能力,打破了帝国主义的核垄断,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提供了有力的保证。因此,中国原子弹的成功研制对与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高铁军^[44]认为,中国发展核武器的重大战略决策,体现了毛泽东的“两条腿”走路的国防现代化建设思想。从上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末,毛泽东始终强调以常规武器和尖端武器相结合为发展目标,并且把重点放在优先发展核武器方面。这些重要的决策对促进我国国防现代化建设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通过总结新中国成立后武器装备发展的历史经验,李大光^[45]认为,国防科技是推动武器装备不断发展变化的直接动力。在整个武器装备的发展过程中,国防科技发展不仅推动现有武器装备的不断改进,而且从根本上创造出全新的武器系统,导致武器装备的革命性变革。作为国防现代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武器装备现代化,也因中国核武器研制所带起的国防科学技术水平的提升而不断向前发展。

历史证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成功研制,不仅巩固了中国的大国地位,促进了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还对国家经济建设、科学技术和科技工业的发展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尽管多数有关原子弹研制的研究成果都会或多或少提及这段历史意义,但目前学界对于中国原子弹成功研制意义的专题性研究还不够充分,甚至可以说较为贫乏。这种研究状况

不仅与中国原子弹研制在整个国家战略中的重要地位不相符合,也不利于对原子弹研制细节和原子弹研制与中国国家安全关系的深入研究,更不利于我们对中国核武器的研制进行整体的了解与把握。开展对中国原子弹研制重要意义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丰富学界对该段历史的理解,并为深入研究原子弹研制过程中重大历史事件和当时的国家安全形势提供了有益的补充。

综上所述,关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历程与重要意义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仍然存在可探讨的问题、可深化研究的领域。在未来的研究中,首先应注重挖掘国际国内的相关史料,并注重对已掌握史料的深入考察,以奠定深化研究的基础。其次,应注重展开对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全方位研究,拓宽研究视野,开阔研究思路,从人物、科研机构、人才培养、铀矿开采、后勤保障、基地建设、国家安全形势以及其重要意义等诸方面入手,丰富关于中国原子弹研制研究的选题。第三,注重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是一段集政治、军事、外交、科技等多个领域为一体的复杂历史,需要对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进行融会贯通才能更好地推动中国原子弹研制历程及其重要意义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 [1] 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7.
- [2] 核工业部神剑分会.秘密历程——记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诞生[M].原子能出版社,1985.
- [3] 李觉等.当代中国的核工业[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 [4] 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中、下卷)[M].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周恩来.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M].人民出版社,1997;聂荣臻.聂荣臻军事文选[M].解放军出版社,1992;聂荣臻.聂荣臻科技文选[M].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张爱萍.张爱萍军事文选[M].长征出版社,1994;罗瑞卿.罗瑞卿军事文选[M].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沈志华,杨奎松.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M].东方出版中心,2009.
- [5] 金冲及.周恩来传[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朱德军事活动纪事[M].解放军出版社,1996;聂荣臻传记编写组.聂荣臻传[M].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周均伦.聂荣臻年谱[M].人民出版社,1999;东方鹤.上将张爱萍(上、下卷)[M].人民出版社,2007;张胜.从战争中走来[M].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
- [6] 宋任穷.宋任穷回忆录[M].解放军出版社,1994;刘杰.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决策者和组织者[A].不尽的思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袁成隆.忆中国原子弹的初制[J].炎黄春秋,2002(1);李觉,怀国模,张开善.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要

- 闻[J].百年潮,2004,(10).
- [7] 葛能全.钱三强和中国原子弹[J].中国科学院院刊,2005,(1);张开善.缅怀我国核武器奠基人之一郭永怀的崇高品学[J].军事史林,2005,(2);朱光亚.对我国核试验的几点回顾与思考[J].神剑,2004,(6);冯京生.热血报国——记我国著名核武器技术专家程开甲(上、下)[J].党史纵横,2005,(5、6);科学时报社编.中国科学家与“两弹一星”[M].暨南大学出版社,1999.
- [8] 吴玉崑,冯百川主编.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简史[M].原子能出版社,2010;谢光主编.当代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M].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
- [9] 东生.天地颂[M].新华出版社,2000;孟戈非.未被揭开的谜底[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彭继超.东方巨响——中国核武器试验纪实[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5;梁东元.596 秘史[M].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原子弹调查.解放军出版社,2005;贾俊明,董学斌.倚天——共和国导弹核武器发展纪实[M].西苑出版社,2009;张开善.中国历史上一次惊心动魄的创举——我国携带核弹头的导弹在本土上空飞行爆炸试验[J].军事史林,2005,(9).
- [10]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 6 卷)[M].人民出版社,1991:395.
- [11] Alice Langley Hsieh.Communist China's Strategy in the Nuclear Era[M].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1962.
- [12] Alice Langley Hsieh.Communist China's Secret Military Paper[J].The China Quarterly,1964,(18).
- [13] 约翰·W·刘易斯,薛理泰.中国原子弹的制造[M].原子能出版社,1991:35.
- [14] L·巴达希和 M·亚历山大,戈云译.第五个核大国[J].世界研究与开发导报,1989,(2).原文载于“Nature”,Vol.336, No.6199,(Dec.8,1988).
- [15] 陈能宽.中国为什么下决心搞原子弹[J].神剑,2005,(2).
- [16] 姚有志,孙党恩.捍卫国家安全、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强盾牌——纪念中国首次核武器试验成功 40 周年[J].军事历史,2004,(6).
- [17] 李俊亭.使中国挺直腰板的战略性抉择[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2).
- [18] 徐焰.外来核威胁迫使中国发展核武器[J].文史参考,2010,(8).
- [19] 张静.核武器与新中国 60 年发展历程[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9,(5).
- [20] 赵学功.核武器与美国对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的政策[J].美国研究,2004,(2);核武器与美国对朝鲜战争的政策[J].历史研究,2006,(1).
- [21] 沈志华.对在华苏联专家问题的历史考察:基本状况及政策变化[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1);援助与限制:苏联与中国的核武器研制(1949-1960)[J].历史研究,2004,(3);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M].新华出版社,2009.
- [22] 沈志华.援助与限制:苏联与中国的核武器研制(1949-1960)[J].历史研究,2004,(3).
- [23] 吴玉崑,冯百川主编.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简史[M].原子能出版社,2010:29.
- [24] 【美】麦克法尔夸,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M].谢生亮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 [25] 戴超武.中国核武器的发展与中苏关系的破裂(1954-1962)[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3)、(5).
- [26] 孙丽,孙大为.苏联对中国核技术援助探析[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9,(5).
- [27] 李继耐.发扬两弹一星精神 推进国防现代化[J].瞭望,1996,(26).
- [28] 朱光亚.我国核试验的几点回顾与思考[J].神剑,2004,(6).
- [29] 张静.核武器与新中国 60 年发展历程[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9,(5).
- [30] 韩文琦,张广宇.新中国国防现代化基本经验浅析[J].军事历史研究,2009,(3).
- [31] 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军事历史分会,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编.发扬优良传统 履行神圣使命[M].军事科学出版社,2008:868.
- [32] 陈士光.大兵团协同作战的实践典范——从两弹工程看周恩来的领导艺术[J].新东方,2003,(12).
- [33] Gordon Chang.“JFK, China and the Bomb”[J].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1988,(74)(4).
- [34] William Burr & Jeffrey T. Richelson.“Whether to ‘Strangle the Baby in the Cradle’: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hinese Nuclear Program, 1960 - 1964”[J].International Security 25, 2000,(3).
- [35] 美国曾提议与西欧,尤其是西德进行会谈,商讨建立一支由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管制制的海基炮兵部队来加强美国在欧洲核武器使用的控制。
- [36] Oral history interview with William C. Foster by Charles T. Morrissey, August 5, 1964, John F. Kennedy Library. (1994 年 9 月解密)
- [37] 刘子奎,王作成.美国政府对发展核武器的反应与对策(1961-1964)[J].中共党史研究,2007,(3).
- [38] 阎俊丽.我国五十至七十年代核战略的美苏因素及现实思考[J].理论导刊,2008,(8).
- [39] Gordon. Chang.“Friends and Enemies: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1948- 1972”[M].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 [40]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 3 卷)》[M].人民出版社,1993:279.
- [41] 若之.毛泽东为什么要搞导弹核武器[J].航天,1994,(2).
- [42] 李峻.建国后毛泽东国防发展战略思想简论[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4,(2).
- [43] 张静.核武器与新中国 60 年发展历程[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9,(5).
- [44] 高铁军.毛泽东国防现代化思想初探[J].军事历史研究,1987,(3).
- [45] 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军事历史分会,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编.发扬优良传统 履行神圣使命[M].军事科学出版社,2008:886.